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女性文学与城市关系刍议

李冬梅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城市是有性别的”,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与女性的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亲和与交融。一方面,城市作为一种生存空间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毫不吝惜地为女性写作提供素材和养料。另一方面,女性也以独有的城市意识和女性立场,通过写作进一步描摹、想象和塑造了城市的个性与现状。女性不仅是城市发展最好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她们不仅是城市文化消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城市文化的制造者,因而也是城市文学最好的表现者。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城市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09-0177-04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城市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更是得到了扩张。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女性写作大踏步跨入“她世纪”。正如谭湘所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众多女作家身置城市的写作是以城市为独有视角的写作,是人在城市这个特定场境中对现实世界的感悟和思考,在她们的作品中,城市是背景,是实指,是题材,是内容,是形式,亦是象征。”^[1]由此可见,女性文学和城市的复杂并且交融共生的,考察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女性”与“城市”的的确确是无法规避的两个重要元素。

一、城市生活与精神的张扬

女性城市文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并于20世纪90年代走向兴旺和繁荣。这与城市发展趋势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女性城市文本透露出女性在与城市一起成长进步的同时,要突破权力和性的约束,因此女性城市文本体现了都市女性的困惑及为突出重围而进行的努力。女性对城市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和亲和,“所谓成长不仅是身体的成长心理的成长,也具体到对公共社会、社会体制的认知情况,最后才是承当孤独的自觉。”^[2]新时期的女性城市文本中女性的成长首先体现在:女性恢复了性别特征,重新审视自我,发现自我。爱情和婚姻重新成了女性存在的必需条件以及女性写作的第一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由启蒙语境转化为市场环境,女性作家们走向了自觉的性别意识道路,完成了由“表现女性”到“女性的表现”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认同、对城市的认同以及对城市表现出的鲜明性别特色。不难看到,进入90年代后,从事城市文学创作的作家当中女性占大多数,而从事乡村文学创作的作家中男性作家居多。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写道“城市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远较乡村适合女性生存。城市中,女性得以摆脱农业社会对体魄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智慧和灵魂”^[3]。王安忆认为女性与现代城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城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

[收稿日期]2013-05-12

[作者简介]李冬梅(1975-),女,江苏徐州人,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性以表现城市而使自己的性别特色突显,而城市也因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入挖掘而使自身真正进入了世人的审美视域。

在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如个体本位、欲望高涨等及时享乐的观念,对传统习俗和文化必然带来猛烈冲击。市场语境下的城市生存面貌、品德规范、价值判断在实际写作中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并得以逼真地再现。城市文化是以物质消费为主的一种文化,女作家们从城市生活到城市精神对城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和较为辩证的理解。在作品中赤裸裸地表现了自我中心意识,表现了个人的欲望与渴求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比如陈染、林白的“私语化”小说和张欣、殷慧芬、唐颖的“新市民”小说确立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性别差异,彻底解放了女性个体,但她们的主观化除了迎合少数人的口味外,并没有接近普通市民的生活。池莉、方方、范小青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掩盖了女性个体意识,以零度情感介入广泛的世俗人生和城市生活。90年代的女性城市小说无疑开拓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丰富了女性小说的内涵。在整合与重建过程中的女性文学要外向一些,精神性话语建立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之上,不像陈染、林白等内向型小说关注心灵独白,而是充满热忱地关注生活,在生活中捕捉精华或者说是典型,进而实现对人类精神包括女性精神的关怀。除了王安忆、铁凝、张抗抗等一批文坛中坚外,还有中青年女作家如叶广岑、王晓玉、赵玫、徐坤、迟子建等,她们以女性的目光注视生活,开掘有关人类命运的永恒话题,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二、生活空间的城市化

在女作家笔下,一个弄堂、一个家庭、一个人物都成了城市和社会的缩影,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穿透力。90年代后,王安忆的视角就转向上海的弄堂深处。在《长恨歌》中,作者本着“用生活的细节来呈现城市精神”这一理念,倾心着墨于琐碎的弄堂生活,用女性特有的温情细数狭窄空间中点点滴滴的精致与忧伤、细腻与平淡、忧伤与无奈……弄堂作为大上海的小角落,虽然平凡,却是实实在在的城市生活主角:幽深迂回的街道、庸常的柴米油盐、服装的流行风尚、美食的细致钻研……这其间包含着女性对自身生活的无限热衷,展现了女性城市生存的现实和困惑。可以说今天的上海,每一步发展的基石都是弄堂人,弄堂里的主角又是女性,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无疑是这个时代上海精神的底色。

广州女作家张欣,她没有愧对经济改革特殊地域的风雨朝露对她的丰厚馈赠,以敏感而忧伤的笔墨,在从《首席》、《伴你到黎明》到《你没有理由不疯》等系列作品中,塑造了一批身处广州这个改革前沿阵地的大城市中的白领女性和她们的城市情爱故事。然而作家没有把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脉动、商战风云和开拓者的激情与畅想上,相反,却以“深陷红尘”的女性的事业、家庭、爱情和友情为视角和出发点,沿着“城市”和“女性”互相交叠的双重脉络进入了广州城市文化的肌理当中。

再看迈入新世纪的女性都市小说,将目光穿透了90年代城市女性小说的咖啡馆、酒吧、购物中心等充满物质欲望的消费空间,最后聚焦于后街里巷的日常生活以及放缓了节奏的生活新目标,展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生存价值,形成了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视野——异地。它是指人们除了工作单位和家庭之外的另一个存身的地方,可能是俱乐部、瑜伽馆,也可能是健身房、茶艺馆或者虚拟的网络空间等,在这样的地方放松、消愁、陶冶情操,获得两点一线之外的独立的精神生存空间。比如东紫的小说《春茶》中梅云,在单位里是有名的贤妻良母,但在出差的异地,她告别了办公室和家庭,暂得精神解脱的须臾,就像摘掉了面具或者说戴上了另外一个面具,在异地获得了重生般的欣喜与幸福。又如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面对丈夫每周末的消失,女主人公陈青选择去“第三地”为其他男人做晚餐,使“第三地”蒙上了一层暧昧色彩。“每一个人总是并处处都或多或少地在扮演一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相互认识,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4]虽然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表演性质。这些对“第三地”的关注和书写,实际是新世纪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空间外开掘出的自己的天地,在家庭和事业双重压力下,女性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或者说需要一种精神解脱或新的生命支撑。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努力,女性的生存空间在一点点发生变化,女性形象也由原来的受欺凌而逐渐成长为有个性、懂得享受的现代女性。女作家笔下的生活空间是真正的城市空间,具有着城市的特色,而在这个空间生活的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也是城市化的。

三、市民精神的肯定

在社会转型期,市民及生存环境成了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文化具有历史性,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在不断演进,城市文化逐渐闯进了人们的视野。这类因时代应运而生的创作丰富了城市文

学的内涵,开创了城市文学写作的新向度。聪慧、敏感的女性作家开始注目城市的生存空间和城市人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并将其进行抽象化,塑造了一系列的鲜明的女性形象,并在这些创作中间接地传达了作家的态度。她们一般对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冲击传统的市民文化持肯定态度。例如,她们赞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观念,对社会主义转型期所刚刚萌生的经济类型及生活场景持乐观态度,认可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的“弱肉强食”。早在20世纪30年代,矛盾在《子夜》中把炒股描写得一无是处,满载着恐惧,而到了转型期,在毕淑敏笔下,炒股得到了作家的重新评判。对于转型期的新生事物,例如舞厅、咖啡厅、轿车等高消费,作家们都将其作为一种正当的精神消费加以肯定。简单概括就是消费欲望变得合法,爱情弥漫了世俗的烟火味。

比如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就是以上海的人和事作为书写内容或者主要题材的写作,“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5]王安忆的作品中表现了上海市民的布尔乔亚式的情结,也就是对小资生活方式的向往。作为一种模式,一个原版,一种理念,这种久而有之的生活方式似是而非地为上海中等阶层市民生活提供了一种理想形态,她笔下的市民女性也多为向往这种生活模式的,期望过上中产阶级的富有生活这一目标激励了她们不断争取和奋斗,王安忆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她的笔下,上海的市民形象通过对王琦瑶、米尼、阿三等女性形象的书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作为“新写实”的重镇,池莉和方方更是市民生活和市民精神的代言人,她们的创作题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武汉底层人的生活,她们都只谈活着不谈爱情,都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都规避个人情感的介入而注重社会化的人生际遇,都能够深入到武汉市民的内心世界,把握城市的内在特质。比如池莉,她平和地、原汁原味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既不夸张讽刺、也不沉郁庄凝,浓郁的生活气息洋溢其中。她尽情讴歌的是平民不屈不挠活着的精神,她笔下的吉玲、陆武桥、辣辣、来双扬代表的是生存智慧、顽强的生命力,较之池莉对市民意识的认可和拥抱,方方是冷峻而深邃的,她选择站在一定距离和高度审视,将笔触直指人类生存的本质内核,“用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手法,近乎残忍地挑开繁华都市的风景”,从《风景》里“河南棚子”内畜生般生活的底层劳动者,到《落日》里“坐山观虎斗”的阴暗心理,在每一部作品中她不断注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审视态度,突显其对生存意义的执著追求。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在城市中逐渐健康地成长起来,甚至林白、陈染们也不再拘泥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女作家们带着强烈的社会性别意识展示了创作实绩,从《富萍》、《逃之夭夭》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再到《笨花》、《小姨多鹤》,不仅呈现了社会的原生态,展现了对城市市民阶层、社会底层的关心和关注,更表现出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作家的自觉、成长、敏锐和人文情怀。她们与当下鲜活、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互动,开始表达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和意见。经历了90年代女性写作的繁荣,新世纪的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和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

四、爱情内涵的扩展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类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以劳动为手段来获得生命力的,并通过本能的动物性繁殖使生命不断地延续。爱情和性欲是人的本能性欲望,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逃离不了的需求,也是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中都必然登场的话题。在17年文学中,在那个忽视了性别差异的时代,是谈性色变的。爱情在无性别的社会环境中,成了一种被耻笑的情感,是文学大门之外的流浪汉。这一时期的文学人物都是中性的,任凭爱情这个流浪汉无数次的望穿秋水,都不会伸出“一枝红杏”。时代进入了历史的转型期,爱情又一次降临了。爱情使文学的生命力更加朝气蓬勃,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80年代,伴随改革的进行,爱情登上了文坛,但这时的“爱情”仍是很抽象的,是对爱情的审美性拷问,具体到什么是爱情,怎样才是爱这些具体的问题就模糊不清了。此时的爱情更像是一种人和动物的二元对立,是夸大了的人的主体情感,是审美化了的情感。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到了社会转型期,爱情具体到了人们的生活,导致了心理的矛盾:婚内情和婚外情、情感和性欲、理性和感性等存在着激烈冲突与碰撞。爱情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包含了更多的情感,在女作家的笔下,爱情好似多棱镜,折射出比以往更多的内涵和外延。

1. 爱情的利益化。所谓利益化的爱情,指的是在一定物质利益或者权力地位等基础上产生的情感。90年代的女性作家作品像《永远的徘徊》、《无人倾诉》、《致命的邂逅》、《冬至》、《如戏》、《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访问城市》等等几十部小说都是以利益化为爱情定义的。不纯粹的利益化选择使

这些女性形象在爱情婚姻中举步维艰,倍感艰辛。如寒池《致命的邂逅》为维持家庭完整所做出的努力,叶佳希为丈夫的事业而不惜抵押自己的“象牙之塔”,谢冰琦做外室独守空房的苦痛,还有茵浓《访问城市》为找一个终身伴侣而不停奔波、疯颠颠颠……有更多女性在金钱或权利的诱惑下,成了有权或有富人包养的“金丝雀”。张梅在《孀居的喜宝》中就为城市女性发表了生存宣言“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看来,女性在物欲化社会中似乎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一个人不能在社会上确立地位,感情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6]在利益化价值观念的驱使下,爱情被包裹上了一层价格的标签,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买卖交易。比如唐颖的《丽人公寓》里的宝宝特别注重对现实繁华世界的关注,她接受澳籍华人安迪的情感的同时也是在接受价值20万元名牌服装、高级首饰、公寓以及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的爱情范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必然也是不牢靠的。实际上,她们不是占有物质,而是被物质占有。

2. 爱情的俗常化。从90年代开始,女作家通过对理想爱情的解构实现了从理想彼岸到现实此岸的回归,把人们拉回世俗人生。因此,她们有关爱情的小说超出了单纯情爱的范畴,而到了现实生活的层面。女作家池莉、方方们倡导的婚恋观就是世俗和现实的。在她们笔下,爱情首先要耐利于现实生活,在习常的社会秩序中,爱情婚姻恰如温室里的花,一旦被置于世俗人生的疾风暴雨、高温日晒下,往往经不起任何考验就已然凋谢。从成名作《烦恼人生》三部曲,到90年代后的《来来往往》、《你以为你是谁》、《生活秀》,无一不是讲述打破理想爱情镜像,回归凡俗人生的故事。池莉用中性的笔调,残酷地践行着她曾高调宣扬的创作观“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不是池莉不相信爱情,她只率直地撕下了爱情虚伪的外表,用平民视角重新审视世俗的爱情婚姻,显示出它在现实生活面前的不堪一击。方方的《桃花灿烂》、《随意表白》也是表现城市爱情的作品,然而她对爱情合法性的质疑直接导致了爱情故事的悲剧性。虽然在其作品中不乏情欲的细致描摹,但她一直都是理性睿智的,她总是把极端的爱情放置于恶劣的生长条件下任之被击败、瓦解,最终消散于生活的日常性之中。对她们来说,生活的铁律最为残酷,就是把一切理想的事物拉下神坛、回归原位,甚至连爱情、婚姻这些本应纯粹、神圣不容侵犯的字眼都带上功利性的现实考量,熏染了人间的烟火,使得爱情婚姻完全俗常化、生活化。

3. 真爱难寻。步入社会转型期,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下,神圣的爱情、浪漫的情感更成为奢侈的东西。“钱好赚,情难觅”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困惑和难题。在寻觅真爱的路上,仍然有秉持“宁缺毋滥”真性情的坚守者在艰难地行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铁凝的《无雨之城》、张欣的《暖冬》、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就塑造了这类难得的城市女性形象。在转型期的现实情状下,她们似乎是有些不可思议,但面对现实她们还保持清醒,明知没有结果,仍旧执迷于此,她们最看重“曾经爱过”。这类女性究其大半生在真爱的理想世界里进行思想的流浪,梦想着永恒的爱与被爱。面对现实的时候,她们不得不低头,即使是短暂的爱过,也非常珍惜。这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至高的精神格调。它不是靠婚姻或道德来维持下去的情感,它是一种高尚的终生心灵相守的坚定信仰。

从新时期初“美丽的梦”到后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爱情的形而上追求一直无果无终,到了90年代,爱情终于落入了现实。爱情不是通过想象而抽象出来的,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和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环境及所处时代密切相关,交织在一起。现实中的爱情还是酝酿于世俗生活中的,因为恋爱的激情从人生的漫长历程看,如闪电一般瞬息间消失。只有在朴素的生活里,在柴米油盐的外衣包裹里寻求地久天长,才能使爱情在世俗的世界里闪出一丝光亮,缓解天长日久的疲惫。

如果说城市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孕育和催生了女性文学,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的女性城市文学,则是一部女性和城市共同成长的成长史。城市给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城市使女性鲜活的生命得以张扬。女性与城市关系的不断演进是90年代以来女性城市文本中的重要内容,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遇到过困惑和挑战,但女性的成长过程对改变男权中心话语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构建两性和谐文化起到了助推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谭湘,丹娅,戴锦华,荒林. 城市与女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四人谈[J]. 当代人, 1998(2): 50.

[2] 荒林,王光明. 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245.

[3] 王安忆. 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89.

[4] [美]罗伯特·E·帕克. 种族与文化[M]. 伊利诺斯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 1950: 250.

[5] 郭运恒. 王安忆“上海书写”中布尔乔亚情结的文化隐喻[J]. 小说评论, 2010(1): 118.

[6] 张欣. 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358.

(责任编辑:曹金钟)